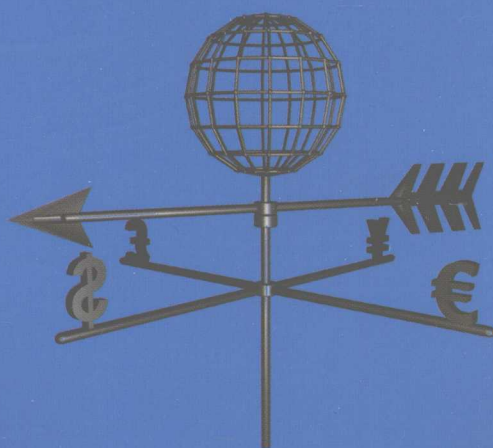


HONGGUAN JINGJI GUANLI
REDIAN WENTI YANJIU

宏观经济管理 热点问题研究

主 编 董正信



河北大学 出版社

宏观经济管理热点问题研究

主 编 董正信
副主编 李惠茹
张玉棉
徐树林

河北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徐树林

王殊宁

封面设计:王占梅

责任印制:蔡进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宏观经济管理热点问题研究/董正信主编.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7

ISBN 978-7-81097-299-4

I. 宏… II. 董… III. 宏观经济-经济管理-研究-中国-文集 IV. F123.1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02345 号

出版:河北大学出版社(保定市五四东路 180 号)

印制:保定天德印务有限公司

印张:18

版次:2008 年 7 月第 1 版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规格:1/16(787mm×1092mm)

字数:460 千字

印次:2008 年 7 月第 1 次

ISBN 978-7-81097-299-4/F·109

定价:50.00 元

目 录

第一部分 宏观经济管理理论与制度创新

从发展观的演变看“科学发展观”的内涵·····	刘建国(2)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特点	
——由长期到短期的视角和基于经济学文献的分析·····	左柏云 付明卫(8)
阐释“中国之谜”——一个基于扩展的总需求总供给模型·····	万光彩 刘 莉(17)
反宏观经济学教条——紧缩期间货币政策对产出、就业无效吗·····	刘 明(30)
论微观督促宏观——思考中国宏观调控制度理念的创新·····	方竹兰(45)
基于 M—F 模型对开放条件下货币政策实施效果分析·····	陈 平(50)
调控内需与外需关系的基本着力点·····	王秀芳(54)
基于自主创新动力机制的激励式宏观管理·····	严北战(60)
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财政制度模式探悉·····	王 静 岳 军(68)
中国政府采购功能的现实定位·····	马树才 杨玉霞(75)
二元经济结构下投资与消费关系调整策略探讨·····	任碧云 王越凤(81)
实现我国东西部区域联动发展需要政府机制创新·····	曹 华(89)
创新发展模式,提升国民经济运行质量·····	张今声(94)
宏观收入分配制度的和谐演进特征·····	刘文勇 焦方义(101)
英国收入分配政策调整的主要措施·····	刘 青 徐树林 刘增莲(107)

第二部分 国民经济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

当前我国流动性过剩问题探析·····	赵玉麟 常卫兵(112)
奥运场馆建设投融资模式的创新与后奥运经营·····	赵青平(122)
江西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	李新建(129)
我国高房价问题的宏观分析·····	朱建中(134)
羊群行为、股价波动与投资收益	
——基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的实证研究·····	张红伟 毛前友(139)
关于政府调控城市房价的思考·····	王雅莉(148)
人力资本投资:观察、分析与选择	
——以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为例·····	刘元胜(153)
长三角城市间第三产业的分工定位与协作·····	谷永芬 宋怡欣 黄 清(158)

唱响和谐社会的主旋律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如何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于凤芹(166)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以城镇居民收入的视角 曲昭仲(176)

我国政府公共支出各阶层不平等因素的计量分析..... 曹景林 葛利锋(181)

构建和谐社会与转换经济发展方式..... 秦宪文(192)

中国西部服务业比重“虚高”吗

——基于 Granger 因果检验的验证 刘 瑞 张 茜(197)

从机会成本看失地农民的补偿问题..... 张备勤 高 洁(207)

我国循环经济的自生能力与可持续性..... 张 静 林木西(213)

河北省沿海经济强省建设对京津冀一体化的作用分析..... 李惠茹 刘 芳 郑彩云(218)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健全就业服务体系 郭 振(223)

从金融资产角度透视我国金融业的公共责任..... 王千红 贾美枝(229)

发展经济租赁房市场是治理我国城镇房价虚高的关键..... 李 华 吴云勇(237)

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资源节约..... 江 勇 王 飞(243)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节能降耗目标的关键所在 胡荣涛 曹亚军(248)

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典型相关分析..... 董正信 张慧娟(253)

我国房地产价格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周 博 董 捷 吴 伟(258)

第三部分 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

国民经济学学科内核若干问题探讨..... 刘 瑞(266)

论国民经济学学科的生存基础和发展导向..... 蒋 选(274)

发展改革部门人才结构现状,呼唤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不断完善 冯建忠(280)

第一部分

宏观经济管理理论与制度创新

从发展观的演变看“科学发展观”的内涵*

刘建国

对中国发展进程中遇到的诸多挑战和难题统筹解决,长短结合,标本兼治,需要一种科学的方法和理念,既要保持充分的理性,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摆脱各种利益集团乃至维护自身利益的社会精英对重大政策和制度设计的干扰和误导;又要面向未来,充分考虑经济全球化的影响,积极学习和吸收其他国家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教训,在低成本获取现代文明的同时,加速我国经济社会的转型。科学发展观正是适应我国现在和今后长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提出的。

科学发展观有着丰富的内涵。要想深入了解科学发展观的内涵,认识用科学发展观统领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要性,必须了解发展经济学对发展观形成过程中产生的积极作用。

发展经济学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它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与一般的西方经济学的差异在于,它研究的对象并非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而是市场发育尚不完善、经济尚欠发达的国家;它不像一般西方经济学那样,主要关注的是发达市场经济短期的繁荣和萧条问题,它着眼于一国长期的经济发展问题;它不像一般西方经济学那样只重视对经济因素的分析,它还特别重视对非经济因素的分析。如果说,早期的研究,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有组织地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话,伴随发展中国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卓有成效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融入发展经济学的研究。

一、经济发展含义的转变——对贫困、失业和收入分配给予更多的关注

在早期的发展经济学文献中,经济学家视野中的经济发展概念就是经济增长,特别是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发展经济学对就业、医疗保健、教育、制度变迁等领域问题的关注,更多地是从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考虑的。20世纪70年代以后,经济发展被赋予了更多的含义,包含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发展的内容。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在《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一书中对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展观的转变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和分析。

在20世纪50~60年代,发展几乎总是被视为一种经济现象。即迅速取得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或者会以就业或其他经济机会的方式,“一滴滴地流到”人民大众身上,或者为经济和社会福利更广泛的分配创造必要条件。与完成增长的任务相比,贫困、失业和收入分配问题都是次要的。

在20世纪70年代,经济发展在经济增长范围内从减少和消灭贫困、不平等和失业方面被重新加以解释。

*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研究”的阶段成果,课题批准号:2006XAA011。

达德利·西尔斯^①提出了有关发展含义的基本问题:对一个国际的发展所提出的问题是:贫困问题已经和正在发生什么变化?失业发生了什么变化?不平等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如果这三方面都从原来的高水平向下降,对这个国家来说无疑是个发展时期。如果这些中心问题的一个或两个方面的情况越来越糟,特别是如果三个方面的情况都是越来越糟的话,即使人均收入倍增,把它叫做发展也是不可思议的。

发展必须包括经济加速增长、缩小不平等状况和消灭绝对贫困,也包括社会结构、公众观念和国家制度等这些主要变化的多方面的过程。从本质上说,发展必须体现变化的全部内容。通过这种变化,整个社会系统应面向系统内的个人和社会集团的多种多样的基本需求和愿望,使大家普遍觉得原来不满意的生活条件已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向更好一些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转变。

丹尼斯·古雷特^②教授提出发展的核心含义和目标。

发展的三个核心含义:最低生活需要、自尊和自由。

最低生活需要,提供基本需求的能力。所有经济活动的基本作用是为尽可能多的人提供克服由于缺乏食物、住房、健康和保护引起的绝望和痛苦的手段。因此,增加人均收入,消灭绝对贫困,增加就业机会,减少收入上的不平等构成了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自尊:要被当作一个人来看待。自尊——一种觉得自己有价值的自尊感,而不是为了他人的目的被作为工具来使用。这种自尊的性质和形式可能随不同社会不同文化而变化。由于在发达国家中与物质价值相联系的自尊具有极重要地位,因此,有价值 and 值得尊重现在越来越只赋予那些拥有经济财富和技术力量的那些国家——那些已经发展了的国家。一旦社会流行的风气把优裕生活,包括物质福利当作尊严和尊敬的基本因素时,物质上“欠发达”的人们要感到受到尊敬和有尊严就变得困难了,正因为发展是一个重要的、必不可少的获得尊严的途径,发展理所当然地成为一个目标。

从奴役中解放出来,能进行选择。最后一个包含在发展的含义中的标准是自由的概念。自由含有社会及其成员具有扩大的选择范围,以及在追求我们称之为发展的社会目标是外部限制最小化的含义。“经济增长的好处并不在于财富造成的幸福的增长,而在于它扩大了人类选择的范围”(刘易斯)^③。财富可以使人们获得他在贫困时不能得到的对自然界和周围物质环境的更大的控制能力。财富还可以使人们获得更多的闲暇的自由,得到更多的物质产品和劳务的自由,或者使人们摆脱物质需要的负担,获得生活在平静的精神世界的自由。

发展的三个目标:

(1)增加能够得到的诸如食物、住房、卫生和保护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数量,并扩大对生活必需品的分配。

(2)提高生活水平。除了获得更高的收入以外,还应提供更多的工作,更好的教育,并对文化和人道主义给予更大的重视。

(3)通过把人们从奴役和依附中解放出来,来扩大个人和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选择的范围。

实现发展的主要标准:(1)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不是能使绝对贫困状况、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就业水平、教育、卫生和其他社会和文化服务的性质和质量得到改善?(2)经济进步是不是既从内部人与人之间、又从外部国家和地区之间两个方面提高了个人和集体的尊严?(3)最后,经济进步是不是扩大了人们的选择范围,使人们从国内外其他任何制度上的奴役和依附状况下解放出来?或者是不是它只是把一种形式的依附,比如说经济上的依附换成了另一种,比

如说思想文化上的依附?

二、从经济发展到人类发展

(一)人类发展的含义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从1990年每年公开出版一本《人类发展报告》,人类发展着重于人类自身的发展,认为增长知识手段,而人类发展才是目的,一切以人为中心。人类发展主要体现在人的各种能力的扩大,这些能力包括:延长寿命的能力、享受健康身体的能力、获得更多知识的能力、拥有充分收入来购买各种商品和劳务的能力、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能力,等等。

《1996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五种有增长而无人类发展的情况^④:(1)无工作的增长(jobless growth)。工作意味着生活保障,没有工作就等于剥夺了一个人的生活能力和发展自己的能力,以及损害了他的尊严。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出现经济较快增长而就业增加缓慢甚至减少的情况。(2)无声的增长(voiceless growth)。民众参与和管理公共事务,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观点,是人类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经济增长并不始终伴随着民主和自由的扩大。有些国家经济增长很快,但远不是民主和自由的。民主和自由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倾向于相互加强的。民主也能促进经济增长。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以饥荒为例说明了民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饥荒很少发生在具有言论自由的民主国家中出现。如果没有选举,没有反对党,没有公众批评的讲坛,那些统治者就不必担心饥荒造成的政治后果。博茨瓦纳和津巴布韦成功地防止了饥荒,而埃塞俄比亚和苏丹却没有阻止饥荒,这两种不同的结果说明了政治参与和民主在促进经济增长、帮助满足民众基本需要的重要性。(3)无情的增长(ruthless growth)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一些国家,虽然经济增长较快,但收入分配不平等反而更加严重了,增长的利益大部分落入富人的腰包,穷人的状况没有得到多少改善,有的反而更加恶化了。(4)无根的增长(rootless growth)。在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领导人把传统文化看作是现代化和发展的累赘,压制少数民族的文化,强迫少数民族和种族接受标准的文化和语言。此外,经济市场化、自由化和国际化的浪潮以及通讯和宣传媒体的迅猛发展也是先进国家的文化渗透到落后国家,结果导致本地文化被外来文化所淹没和同化。一种具有包容性和参与性的增长模式能够培育和增强文化传统,从而能够为人们以相互丰富的方式享受他们的文化打开无限的机会;但是,一种具有排外性和歧视性的增长模式却能够毁灭文化的多样性,降低人们的生活质量。(5)无未来的增长(futureless growth)。不顾自然资源耗竭和人类居住环境恶化而换来的增长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也不值得持续下去。它不仅破坏了当代人的生活条件 and 健康,而且更严重的是对后代人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甚至是不可逆转的损害。

(二)人类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

《2003年人类发展报告》^⑤分析了经济持续增长对摆脱贫困、提高人类发展水平的两个作用:

第一,它直接提高平均家庭收入。当低于贫困线的家庭能分享到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就可以直接减少收入极端贫困的范围。经济增长对于将穷人的收入提高到贫困线以上有着强有力的推动力。但是这样的成果并非是自动生成的。如果收入不平等扩大了并且穷人无法充分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这些成果就被浪费了。因此,《千年发展公约》强调采取行动以确保穷人对重要资产的获得——包括保障土地使用权、使从事小型经济活动更容易、支持劳动力密集产品的出口以及扩大小额贷款的范围等。要注意到,当最初的收入不平等小的时候,经济增长就

能更多地减少贫困。

第二,经济的增长也能通过提高政府的财政收入,使其能够增加教育、基础设施、疾病控制以及健康(特别是孕妇和儿童的健康)方面的公共投资,从而在减少收入的贫困方面间接发挥作用。这些投资还有助于提高工人的技能和劳动生产率以及穷人的市场收入,促进经济的增长。而且这也能减少非收入贫困。总之,对穷人的公共投资刺激了经济的增长,而经济增长维持着这样的投资。

良好的教育和健康对于人们的福利具有内在价值。而且二者密切相关:教育有助于改善健康,良好的健康有利于更好的教育。教育促进了经济增长,提高了贫困人口的收入;健康的改善也产生了重要的经济回报。经济增长为教育和卫生保健的投资提供了更多的资源,这些投资有利于更高水平的增长。

《1993年世界发展报告:投资于健康》进一步分析了收入及其分配对健康(人类发展)的影响^⑥。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越高,人们的寿命可能越长,身体越健康。当然,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这种影响会逐步消失。人均收入(按购买力平价)从1990年的1000美元翻一番,预期寿命相应增加10岁,而从4000美元再翻一番,仅增加4岁。收入增长对贫困者的影响更大,因为额外的收入能购买基本必需品,特别是食品和栖身之所,而这些对健康带来的利益特别大。

因为贫困对健康有着强有力的影响,所以,不仅仅人均收入与此有关,而且收入的分配,以及处于贫困的人口数量与这个关系也很大。在工业国,人们的预期寿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收入分配,而不是人均收入,在那些收入分配得到改善的国家中,人们的寿命期增加较快。在1970年,日本和英国的收入分配和预期寿命大致相同,但此后却拉开了距离。目前日本人的预期寿命在世界上最长,收入分配最均等。在英国,自80年代以来收入分配的差别有所增加,目前寿命比日本少3岁。一项研究考察了贫困数据可比(按1985年购买力平价计算,每天消费不到1美元的人在人口中的比重)的22个发展中国家,结果表明,贫困的普遍性和用于卫生的人均公共开支方面的差异,是说明各国预期寿命各不相同的重要原因。一旦考虑了这两个因素,人均收入的差异就变得不重要了。在22个国家中,经济增长对预期寿命所产生的影响,1/3是通过减贫,2/3则是通过增加公共卫生开支。在斯里兰卡,人均公共卫生支出的增加比平均收入增加同样数额对减少婴儿死亡率的有效性高21倍。

提高贫困者的收入是改善健康状况最有效的经济政策,因为穷人最有可能以改善其健康状况的方式增加额外的收入:如改善膳食、获得安全的饮用水、改造排污系统和住房等。在维护健康方面,穷人具有最大的需要。所以,对健康而言,既能促进平等又能促进增长的政府政策要好于只促进增长的政策。

扩大教育的政策对改善人们的健康状况同样是至关重要的。受教育较多的人可以更有效地寻找和利用信息。就是说,迅速地扩大教育机会是提高健康水平的成本效益好的方式。

三、从环境保护、生活水平的提高、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的视角看待经济发展

1987年,国际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在其学术报告《我们共有的明天》中广泛使用了“可持续发展”一词,它是指“在不牺牲未来几代人需要的情况下,满足我们这代人的需要”。《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的主题是“环境与发展”,该报告认为,环境不像教育、医疗卫生、营养和预期寿命等,可能随着经济发展而改善,它有时可能由于这种发展而遭到破坏。此外,受害于这种破坏的人可能并不是受益于发展成果的人。他们可能是现在的穷人,也可能是继承了遭到破坏的环境的未来几代人。可持续的发展就是能长期延续的发展。今天享受经济发展成果的人,

由于过度破坏地球的资源 and 污染地球的环境,可能会使今后几代人的处境恶化。因此,在制定发展政策时要综合考虑环境问题。^⑦

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对经济发展赋予了更丰富的涵义^⑧,该报告对经济发展的定义为:包括物质资料、教育、医疗卫生和环境保护等内容的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从更广的意义上讲,人们认为发展还应包括其他重要和相关的内容,主要有机会的更加平等,以及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因此,经济发展的总目标就是人民不分性别、信仰、宗教、种族、地区和国家,在经济、政治和公民权利上的提高。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发展面临的挑战就是提高生活质量。生活质量的改善通常需要收入的增加——但不仅如此。就像改善生活质量本身的目的——它还包括改善教育状况,提高医疗卫生和营养水平,减少贫困,以及更清洁的环境、更均等的机会、更多的个人自由和更丰富的文化生活。

任何严格的经济进步的概念必须至少能注重人均收入的增长对减少贫困和增加公平的作用,以及对教育、医疗卫生和营养、环境保护的作用。

四、协调发展与公平的关系——对公平予以更多的关注^⑨

以公平作为发展的中心,是对过去 10~20 年围绕市场、人类发展、治理和赋权的发展思想要点的提升和整合。在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中追求更为公平的竞争环境的诉求,可以整合世界银行建立有利于投资的制度环境和赋权于穷人这两大支柱。通过确保所有人的个人权利、政治权利和财产权利得到制度上的保障,国家将能够吸引数量远远超过以往的投资者和创新者,并且大大提高为全体公民提供服务方面的有效性。从长期看,增加公平是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根本。加速贫困国家的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对减少全球不公平和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公平能够提高经济增长对减贫的效率^⑩。公平性的基本定义是人人机会均等,这应成为任何发展中国家成功的减贫战略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弗朗西斯科·布吉尼翁指出:“公平性与追求长期繁荣是相辅相成的。提高公平性对于减少贫困具有双重的益处。提高公平性有利于持续的全面发展,同时为社会里的最贫困群体带来更多的机会。”《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得出结论认为,有利的公平性政策可以缩小国家内部和国与国之间的财富和机会不平等的差异。我们的目标不是追求结果的平等,而是增加对贫困人口医疗、教育、就业和资金提供资助的通道,保障他们的土地权益。重要的事,公平性要求提高获得政治自由和政治权利的平等性。这也意味着打破角色定位和歧视,改善利用司法制度和基础设施的通道。《报告》认为,公平不等于收入的平等,不等于健康状况的平等,也不等于任何其他具体结构的平等,而是对一种机会均等的状况的探求,在这种状况下,个人的努力、偏好和主动性,而不是家庭背景、种族或社会性别,成为导致人与人之间经济成就不同的主要原因。

国际经验表明,各国政府常常把改进健康和教育状况作为一种公共责任。在教育和卫生保健等领域,政府既是主要服务的提供者,又是服务的出资人。经济学给出了两个有关公共责任的理由^⑪:第一,由于市场失灵,服务的产出总量和消费总量可能低于没有政府干预时的社会最佳水平。市场失灵可以产生种种外部性,如对传染性疾病的有效控制能够保护公众的健康不受损害,教育可以促进各种有用的知识在公众中的传播,基础教育是培养健康、有技能和富有活力的劳动力大军以及成功地在世界市场进行竞争的基础。^⑫在没有市场激励公共物品

生产的情况下,需要政府进行干预。第二,出于公平的考虑。改善穷人的健康和教育状况方面的差距常被认为是政府的责任。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主张个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实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后来的许多国际协定扩大了健康和教育权的范围,许多国家的宪法都有对于健康和教育的保障。把健康和教育作为基本人权的观点为政府承担公共责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五、简短的结论

从发展观的演变可以看出,“科学发展观”特别强调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即“以人为本”。从消除贫困、失业现象,到公民财产安全和尊严的维护;从单纯的经济增长到收入分配的改善;从只注重经济发展到更关注人类发展,关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协调,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从过分强调竞争性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到充分认识公平对于保持长期繁荣的重要性;为了克服健康和教育等领域的市场失灵,政府应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政府的主要公共责任是为全体公民创造一个尽可能均等的发展机会;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对青年教育、健康、就业、组建家庭和行使公民权利的投资,是政府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⑩。

注 释

①达德利·西尔斯:《发展的含义》,《国际发展协会第11届世界大会》,新德里1969年版,第3页。

②丹尼斯·古雷特:《痛苦的抉择:发展理论的新思想》,纽约埃西尼姆出版社1971年版,第23页。

③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是合乎需要的吗?》,载于《经济增长理论》,伦敦艾伦与阿尔文出版社1963年版,第420页。

④转引自《经济发展理论与政策》第18~20页,郭熙保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⑤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3年人类发展报告——千年发展目标:消除人类贫困的全球公约》第17页,中国财经出版社2003年版。

⑥世界银行:《1993年世界发展报告:投资于健康》第8、第40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

⑦世界银行:《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发展与环境》第1~8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

⑧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发展面临的挑战》第4、第31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

⑨世界银行:《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公平与发展》第17页。

⑩约翰·罗默:公平促进效率:对《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的评论,《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6年第3期第9页。

⑪世界银行:《2004年世界发展报告》第33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

⑫世界银行:《1998/99年世界发展报告》第55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

⑬世界银行:《2007年世界发展报告:发展与下一代》,中文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主要参考文献

[1]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中文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1992、1995、1997、1998~99、2004、2006、2007年版。

[2]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中文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1998、2002、2003、2005年版。

[3]M. P. 托达罗:《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中文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4]约翰·罗默:公平促进效率:对《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的评论,《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6年第3期。

[5]郭熙保主编:《经济发展理论与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作者单位: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特点

——由长期到短期的视角和基于经济学文献的分析

左柏云 付明卫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伴随着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不是短期的,已经成了常态。本文试图换一个角度谈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问题。我们发现,这些问题在现行的中国有内在的客观生成机制,所以具有合理性,与其说是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问题,不如说是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特点。

一、宏观经济长期在不和谐中保持高速增长

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06年,中国经济以年平均9.8%的速度持续高速增长,人均GDP上升了8倍^①,中国经济总量在全世界中的排名由当时的中下游上到目前的第4位。中国经济取得的成绩举世瞩目。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始终伴随着太多的不和谐因素:

1. 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基尼系数作为衡量收入差距的一个国际通用指标,在中国2000年就冲破了0.4的国际警戒线,一般认为目前已达到或超过0.45。这个指标已超过了所有欧洲国家,在亚洲也仅次于菲律宾。中国收入差距的一个主要方面是城乡收入差距。改革开放以来,城乡收入差距总体上呈现出扩大的趋势。1978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比为2.6:1,2006年这一比例为3.3:1。在既有的文献中,收入差距可能通过五个机制来降低经济增长的速度(王永钦等,2006)。

2. 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失调。1978~2005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56.7%,远低于国际上的平均水平;而同期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6.3%。在此期间,居民消费率出现了大幅下降,尤其是2000年以来消费率的大幅下降与经济的稳定高速增长形成鲜明对比(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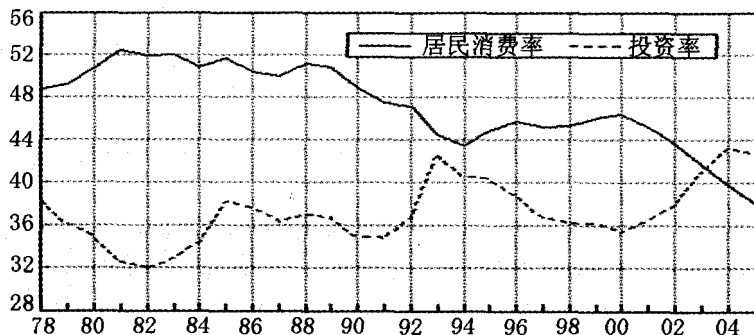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的居民消费率和投资率(1978~2005)

说明:1. 居民消费率=消费率×居民消费在最终消费中的比例;2. 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6)》。

3. 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不合理突出表现在第三产业发展明显落后。改革开放以来,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 1978 年的 24.2% 缓慢上升到 2006 年的 39.4%, 远低于同我国处于相同发展阶段国家的平均水平 53%。^② 尤其是 2000 年以来的几年里, 虽然国民经济高速平稳增长, 但第三产业所占比重没有明显提高, 2006 年仅仅比 2000 年高 0.1 个百分点。因为服务业以劳动力密集型的中小企业为主, 所以服务业发展落后减少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使得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无法转移到非农产业, 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明显落后,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难以消除。

4. 粗放经营, 高投入、低产出。例如, 2006 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总量的 5.5%, 但能源的消耗占世界总量的 15%。^③

这些因素都是不利于经济稳定增长的, 有的学者也据此预言, 中国的经济增长难以为继, 国外甚至有人断言中国经济会发生崩溃。但事实证明, 这些判断思维和结论都是不对的。那么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在太多的不和谐中长期保持高速增长呢?

林毅夫等认为(1998), 中国经济能持续高速增长的原因是中国抛弃了改革开放前的赶超战略, 实行了比较优势战略。“改革以前中国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推行了不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而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的关键则在于改革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 使中国所具有的比较优势能够发挥出来”。新中国成立时, 对于一个资本稀缺的农业经济, 为了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 国家不得不扭曲宏观经济环境, 实行资源的计划配置制度和激励效果低下的微观经营机制(这就是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而起步于微观经营机制的改革因为做对了激励, 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 所以推动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按照他们的解释, 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之所以没有成功, 是因为它们的改革选择了一条激进的道路。

但王永钦等(2006, 2007)认为, 中国经济能持续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特殊的政治和社会结构。这个政治和社会结构主要就是社会(城乡)分割、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以及关系型社会, 它们分别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有效的资本积累方式、激励结构和合约实施方式。“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政治和社会结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 其中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是当代中国政治和社会结构的核心特征, 而经济分权的核心是财政分权。在本质上, 这三个方面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正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 中央政府难以对地方政府进行监控, 因此, 为了解决对于地方政府的激励问题, 中国采取了财政分权体制”。张晏、龚六堂(2006)用面板数据检验了 1986~2002 年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发现 1994 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他们进一步指出, 渐进的改革在中国的成功也许具有偶然性, 渐进和激进两种改革方式的优劣还取决于转型国家在改革前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中国渐进式的改革道路之所以能够成功, 是因为中国改革中保留下来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在经济发展早期都有利于经济增长。

我们认为上述学者的解释具有可信度。同时, 我们认为, 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在不和谐中长期保持高速增长, 是因为中央政府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方向, 不断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提供新的制度供给, 并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辩证思维, 通过经济发展和不断改善居民生活福利来弱化各种不和谐因素的冲突性。这一点也是中国经济继续在不和谐中保持高速增长的保证。

二、高增长没有伴随高通货膨胀

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的经济增长举世瞩目, 尤其是中国经济近 10 年来的“高增长、低通胀”

局面吸引了广大学者的注意力。由图2可知,自1997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保持在7.6%~10.7%之间;通货膨胀率在-1.4%~3.9%之间,远低于改革初期。而按照国际经验,如此高的经济增长率一般会伴随着较高的通货膨胀。尤其是,中国在90年代末出现通货紧缩的情况下,仍能保持高于7%的增长速度,这明显和通货紧缩会伴随着经济衰退的经验相悖(Bordo, Lane and Redish A., 2004)。这构成了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第二个显著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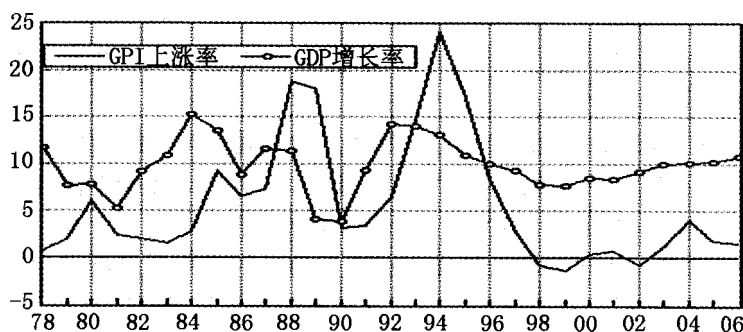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1978~2006)

说明:1978~1984年的CPI指数用《中国统计年鉴(1985)》中的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代替,1985~2005年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6)》,2006年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中国这种“高增长、低通胀”的图景与以前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引起了广大学者的兴趣。

根据宏观经济理论,“低通胀、高增长”可能来自一个正向的供给冲击,例如技术进步。在总需求曲线不变的情况下,正向的供给冲击使得总供给曲线向右移动,导致均衡产出增加、均衡价格下降。这种解释类似于对美国20世纪90年代“新经济”的解释。许多国内外经济学家都持这一观点(龚刚,2002;Bernanke,2002;Bordo and Lane,2004;Cargill and Parker,2004)。本文作者同样支持这种看法,但认为,重要的是要分析导致这个正向的供给冲击的主要因素。显然,仅仅技术进步不能概括所有。中国政府曾经连续5年(1998~2002)采取扩张性的宏观调控政策。这些政策使得在低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情况下的高经济增长得以实现。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在2002年3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如果我们没有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谨慎的货币政策,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已经停下来了”。但考虑到,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才开始重视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宏观调控政策^④,那么现代宏观调控政策的引入也可能从制度革新的角度推动了总供给曲线向右移动。当然,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是这个制度革新的主要内容。

由图2还可以发现,1998年、1999年和2002年三年的经济增长率没有出现大幅下跌,但物价上涨率为负数,即“通货紧缩”。与西方国家20世纪70年代末的“滞胀”相对应,学者们把这个现象称作“缩长”。

林毅夫(Lin,2000,2004)认为,“缩长”是由于1998年前的投资过热造成了生产能力扩张、产能过剩,1998年开始的紧缩政策带来了通货紧缩。“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是由高投资率驱动的。高投资率带来了生产能力的快速积累,同时也增加了总需求。生产能力的快速积累要求转移更多的劳动力到城市工作。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使得这种转移成为可能。而中国

的商业银行体系则为高投资率提供了廉价的金融资源。过度投资不仅在未建成生产能力之前创造了过度需求,而且加速了通货膨胀。同时在建成之后突然增加了大量生产能力。所以,当政府通过需求管理采取反通胀的政策时,生产能力就会过剩,从而产生通货紧缩”。林毅夫的观点比较具有解释力。1992年后,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央政策的鼓励下,地方主义的投资行为开始形成并且愈演愈烈,过度投资导致了随后三年分别高达14.7%、24.1%和17.1%的通货膨胀率。中央政府开始采取紧缩的政策对过热的投资进行打压,并于1996年成功实现“软着陆”,但1997年就出现了通货紧缩的势头。^⑤

当然,对于通货紧缩,我们也可以用货币主义学派的观点去解释。按照他们的观点,任何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都与货币供给有关。虽然通货紧缩时期中国的货币供给也在增加(见图3),但货币的构成发生了重要变化(见图4),因此同样的 M_2 货币供应量提供的流动性服务却大大下降。凯恩斯在《货币论》第一卷中写到,当居民货币财富在现金和储蓄存款之间相互转移时,不变的货币总量没有反映出流通领域发生的重要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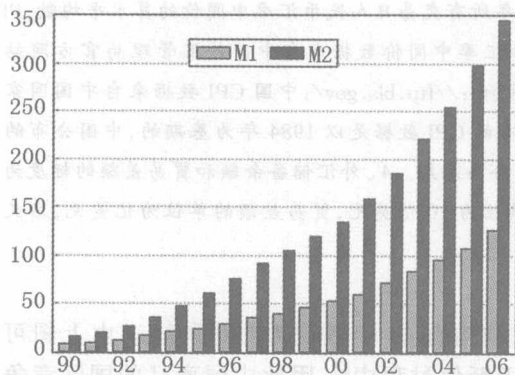


图3 中国的货币供应量 M_1 和 M_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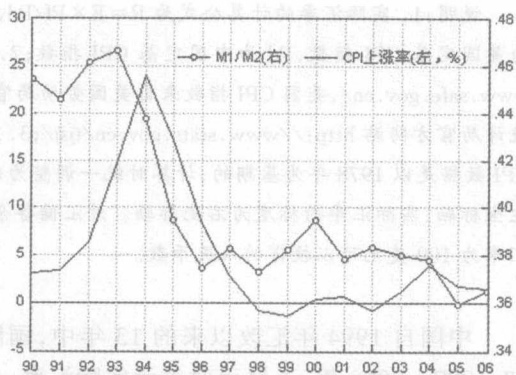


图4 M_1/M_2 与通货膨胀率的关系

说明:1990~2005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6)》,2006年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货币供给的单位为1000亿元。

由图4可知,1993~1996年, M_1/M_2 之值大幅度下降,之后通货膨胀率也大幅下降。1998年 M_1 占 M_2 的比例有个显著下降,在随后的1999年上升;实际上, M_0 占 M_1 的比例也经历了相似的先降后升的过程,1997年、1998年和1999年分别为29.22%、28.76%和29.35%。这个下降正好对应着当年及后年的通货紧缩。2002年的轻微通货紧缩也与2001年 M_1/M_2 和 M_0/M_1 的下降相关。从理论上讲,储蓄存款和定期存款的流动性明显比活期存款低,活期存款的流动性又远低于现金。因此,尽管货币供给在增加, M_1/M_2 和 M_0/M_1 的下降导致的流动性服务总量的下降完全可能导致通货紧缩。凯恩斯在《货币论》第二卷中写到,从1920年到1926年间,英国存款账户占总账户的比例(the proportion of deposit(savings) accounts to total accounts)从38%上升到了46%,这个转变是一个没有度量到的通货紧缩,足以解释同期物价下降水平的20%。

三、人民币升值,顺差扩大和外汇储备剧增

中国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双顺差”已经持续多年,这直接导致了我国外汇储备的大幅

增加。中国外汇储备自1996年突破1000亿美元后,一直大幅增加,2007年6月末达到13326亿美元(见图5)。如此规模的外汇储备明显太大^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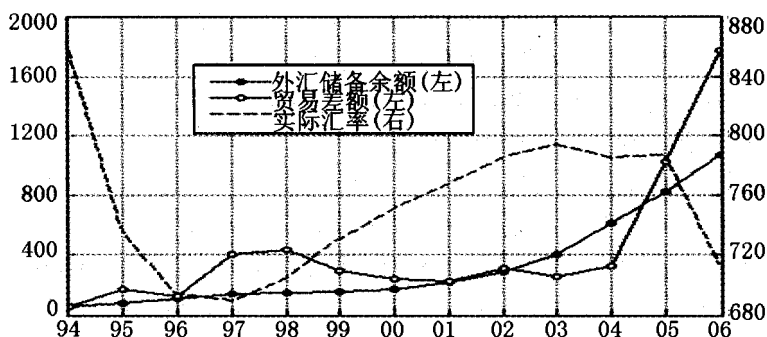


图5 中国的外汇储备余额、贸易顺差和实际汇率(1994~2006)

说明:1. 实际汇率的计算公式为 $R = E \times P_f / P_d$, E 为一年所有交易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的算术平均数, P_f 为美国定基 CPI 指数, P_d 为中国定基 CPI 指数;2. 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数据来自中国外汇管理局官方网站 www.safe.gov.cn/, 美国 CPI 指数来自美国劳动局官方网站 [ftp://ftp.bls.gov/](http://ftp.bls.gov/), 中国 CPI 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http://www.stats.gov.cn/tjsj/>;3. 美国公布的 CPI 数据是以 1984 年为基期的, 中国公布的 CPI 数据是以 1978 年为基期的, 计算时统一调整为以 1994 年为基期。4. 外汇储备余额和贸易顺差的标度为左坐标轴, 实际汇率的标度为右坐标轴。外汇储备余额的单位为 10 亿美元, 贸易顺差的单位为亿美元, 名义汇率为 100 美元可以换得的人民币数。

中国自 1994 年汇改以来的 13 年中, 国际收支结构有 12 年表现为“双顺差”。由上图可知, 1997~2003 年, 人民币对美元实际汇率一直处于贬值过程中^⑦, 因此中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 贸易持续顺差也就理所当然(此间每年贸易顺差在 225.5 亿~434.7 亿美元的区间内波动)。另一方面, 因为发展中国家要吸引外资以弥补国内资本不足, 而外国来华直接投资必然导致资本项目的顺差。结果, “双顺差”导致外汇储备稳定增加。

然而, 由图 5 可知, 自 2003 年以来, 人民币实际汇率开始升值, 但贸易顺差却巨幅增加, 外汇储备以每年约 2000 亿美元的幅度攀升, 于 2006 年底超过 1 万亿美元(具体时间是 2006 年 10 月末)。这无疑也是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一个显著特点。那么, 这个显著特点背后的内在生成机制是什么呢?

左柏云(2006)认为, 中国外汇储备具有内生和外生两种自我强化机制。其中内生机制有两种表现形式: 一是外汇储备增加——货币投放扩大——投资过热、产能过剩——加大出口——经常项目顺差扩大——增加外汇储备; 二是外汇储备增加——人民币升值预期加大——资本流入扩大——资本项目顺差扩大——增加外汇储备。第一个渠道的分析特别强调在中国内需不足的条件下, 产能过剩导致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扩大出口的努力。林毅夫等(林毅夫, 2007; 龚刚、林毅夫, 2007)也曾从产能过剩的角度解释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这两种渠道应该较好地解释了 2003 年以来外汇储备地大幅攀升。如果这种解释成立, 考虑到投资建成所需的时间, 那么导致当前顺差扩大、外汇储备剧增的产能过剩应该是 2004 年以来投资扩张所形成的。而目前继续延续的投资扩张又为未来产能过剩、出口加大、外汇储备增加提供了基础。